



最新中国考古大发现

——中国最近 20 年 32 次考古新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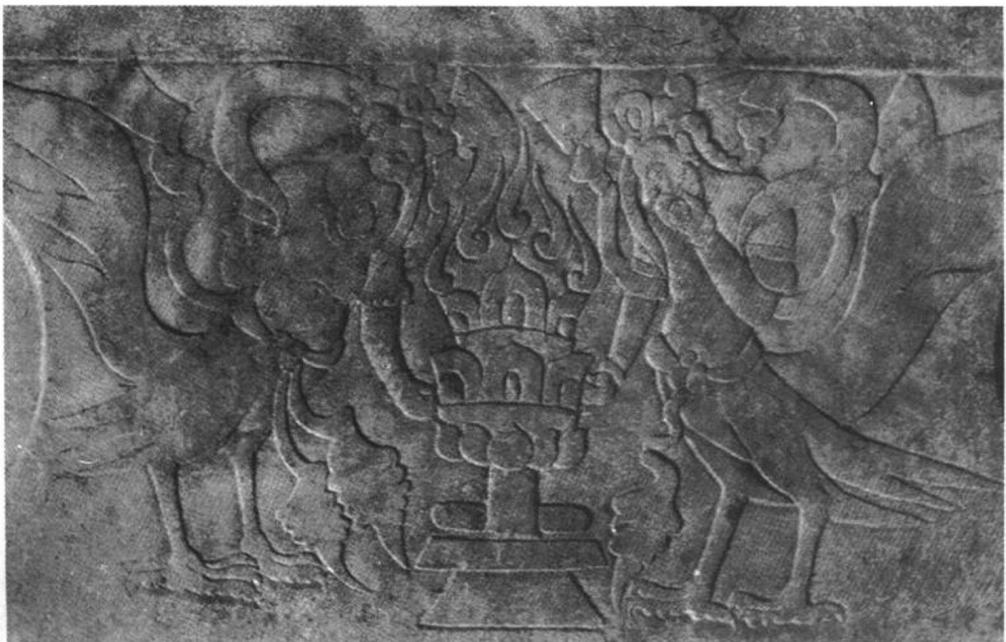
许 虹 范大鹏 主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

最新中国考古大发现

——中国最近 20 年 32 次考古新发现

许 虹 范大鹏 主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最新中国考古大发现：中国最近20年32次考古新发现/
许虹、范大鹏主编。—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9
ISBN 7-80603-649-0

I . 最... II . ①许... ②范... III . 考古发现－中国－普及读物 IV . K8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2315 号

书 名 最新中国考古大发现——中国最近 20 年 32 次考古新发现

主 编 许 虹 范大鹏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2060055-5420

市场部 (0531)2906847(传真) 2060055-5436、5439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webmaster@www.sd-pictorial.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厂 址 山东省临沂市解放路 76 号 邮编 276002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 开 (787 × 1092 毫米)

13.5 印张 242 幅图 18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I S B N 7-80603-649-0/k · 146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前言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研究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令人震撼的重大考古发现几乎是接踵而至。并且与以往不同，这些重大考古发现，几乎每次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1991年开始，国家文物局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活动，迄今已历12年。

12年来，该项活动一共评选出120项重大考古发现，时代从旧石器时代直至明清，涵盖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地域上则覆盖北京、河北、陕西、山西、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等27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无论从时间上、地域上，这项活动都基本将全国12年中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包括在内，集中反映了这些年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成就。

本书正是以上述评选为依托，选取若干重大发现，以时代为序，力争通俗易懂，有重点地介绍了涉及考古发掘的几个方面，诸如遗址、墓葬、窖藏、古建筑等。就某个方面而言，我们尽可能编入同类之中较为典型的项目，以拓展读者对考古发掘的视野，再现形象生动的古代历史。

拿墓葬为例，我们注意到陪葬坑的发掘。这是古代王侯贵族厚葬的一种独特葬制，反映了历史上某个历史阶段的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东方墓葬文化。尤其是主墓未动而发掘的该墓的陪葬坑，从出土的器物上，更能了解到古代葬制体现出的特权思想。如秦始皇陵的水禽陪葬坑，不像常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埋葬了一批生禽，而是埋葬了一批青铜制作的水禽，并以此作为一种象征供墓主人享受。再如山东洛庄西汉某诸侯王墓，主墓未动，而周围即发掘了30多座陪葬墓，已经出土青铜礼器、乐器和大车马器等3000多件，这将给人们留下丰富的遐想空间。

此外，由于科学的进步，考古工作者早已不再停留在“锄头考古学”阶段，而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田野发掘，而且从地上钻探发展到空中遥感，从陆地考古延伸到水下考古。这些情况，也应介绍给读者。因此，我们也编入了两篇文章，其体例或与其他篇目有所不同，但这也是今后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发掘的方向，不可不知。另外，由于本书各个篇目的作者大多为考古发掘项目的主持人和参与者，因而内容真实可靠，推测言之有据，议论有感而发，加之文风朴实，行文简约，知识性和可读性也得到了保证。

目 录

- 1. 旧石器考古的圣地**
——泥河湾盆地远古人类遗迹寻踪·梅惠杰 / 1
- 2. 中国新石器革命的摇篮**
——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揭秘·周广明 / 5
- 3. 长江下游史前文明的明珠**
——金坛三星村遗址考古收获·王根富 / 10
- 4. 见证大变革时代到来的史前遗址**
——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与发现·张玉石 / 19
- 5. 透视龙山文化的深厚内涵**
——城子崖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张学海 / 25
- 6. 良渚文化的最大中心**
——莫角山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赵晔 / 32
- 7. 甲骨文的第三次大发现**
——殷墟花园庄东地窖藏甲骨问世的经过·刘一曼 / 38
- 8. 罕见的商代高级武将墓**
——殷墟郭家庄 160 号墓发掘记事·刘一曼 / 43
- 9. 扑朔迷离的青铜世界**
——三星堆遗址探秘·陈显丹 / 49
- 10. 级别最高、随葬器物最丰富的周代贵族墓**
——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考古收获·王龙正 姜涛 / 56
- 11. 开启神秘的古应国之门**
——应国墓地的发现与发掘·王龙正 孙清远 / 63
- 12. 青铜礼乐祭祀神祇**
——郑国祭祀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蔡全法 / 71
- 13. 改写春秋古国历史的一次偶然发现**
——长清仙人台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方辉 / 78
- 14. 越国王陵横空出世**
——绍兴印山大墓的发现与发掘·陈元甫 / 83
- 15. 破解千古“碣石”之谜**
——辽宁绥中姜女石秦汉建筑群遗址揭秘·杨荣昌 / 89

- 16. 大火烧过水禽坑**
——秦始皇陵水禽陪葬坑发掘始末·张颖岚 / 97
- 17. 岭南文化艺术的奇迹**
——南越国宫署御苑遗迹·广文 / 102
- 18. 震惊世人的发现与发掘**
——洛庄汉墓发掘纪实·胡思永 / 107
- 19. 墩山作郭 穿石为藏**
——永城西汉梁国王陵的发现与发掘·张志清 / 114
- 20. 三次被盗，犹有惊人发现的王后墓**
——长沙渔阳墓的发现与发掘·宋少华 / 120
- 21. 滇文化的地下宝藏**
——一个匿名电话引起的考古发现·杨帆 / 125
- 22. 世纪性的考古大发现**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与发掘·宋少华 邱东联 / 132
- 23. 中国艺术史上的波斯风**
——中国祆教画像石研究·姜伯勤 / 139
- 24. 运河考古的首次大发现**
——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的面世·闻绪杭 / 145
- 25. 千年古寺“佛光”再现**
——青州龙兴寺的发现与发掘·夏名采 / 150
- 26. 富庶甲天下的东方之珠**
——唐代扬州古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蒋忠义 李久海 / 159
- 27. 草原深处宰相冢**
——劫后余存的赤峰耶律羽之墓葬·侯峰 盖之庸 / 167
- 28. 渤海国社会风貌的缩影**
——黑龙江宁安虹鳟鱼场渤海墓群的考古收获·金太顺 / 172
- 29. 明定陵以后的最大发现**
——梁庄王墓5000余件珍宝重见天日·梁柱 / 撰文 余乐 / 摄影 / 180
- 30. 白酒酿造工艺的无字史书**
——解开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的谜底·陈剑 / 撰文 李绪成 李升 / 摄影 / 184
- 31. 用“上帝的眼睛”看世界**
——中国航空遥感考古纪要·张伟 / 撰文 杨林 / 摄影 / 191
- 32. 探索碧波之下的蓝色文明**
——中国水下考古的最新发现·鲁娜 / 撰文 李滨 徐海滨 / 摄影 / 198
- 编后絮语 傅光中 / 208

旧石器考古的圣地

——泥河湾盆地远古人类遗迹寻踪

梅惠杰

一、沧海桑田

中新世（约2500—1200万年前）发生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在华北地区产生了一系列的构造断陷盆地。伴随着山体持续地抬升，盆地大幅下沉，这个封闭性的盆地内不断接受来自周围的积水，在上新世末、更新世初，即大约二三百万年前，终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内陆湖，它包括今天的阳原盆地、蔚县盆地和大同盆地，横跨河北、山西两省，面积达9000多平方公里。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了30多种古老的哺乳动物化石，如三趾马、蹄兔、猛犸象、四不象鹿（麋鹿）、剑齿鹿、巨骆驼、中国鬣狗及野牛、犀牛、狼、野猪、羚羊等。这些动物化石被命名为“泥河湾动物群”，代表着更新世前期一百几十万年间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哺乳动物。其它像多刺鱼、鲤鱼、丽蚌、蚬、螺等水生动物也多有发现。根据这些动物的习性分析，那时这里的气候虽然由热变凉，但仍然比较暖和。

随着地壳活动和气候的变化，古湖的水域也经历了多次的变化。丰水期时，湖水占据了整个盆地；水位下降时，湖面则仅分布于盆地的中心地区。在漫长的岁月中，风沙、山洪、火山喷发等使湖中堆积了大量的沉积物质，湖床不断上升，到几万年前的更新世晚期，湖水切穿了湖盆东端的石匣里峡口向东流去。盆地中的残余水流则最终形成了今天美丽的桑干河。桑干河自西南向东北蜿蜒流经盆地中部，注入官厅水库，成为永定河的上游。

二、享誉世界的泥河湾盆地

20世纪20年代，来华的科学家和传教士中，有些人从事着古生物学、古人类学以及史前遗物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法国神甫桑志华、古生物和史前学家德日进、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等人在河北阳原县泥河湾村一带发现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并对其进行研究，同时把出土化石的古湖泊沉积物命名为“泥河湾层”，自此以后，泥河湾层一直作为华北第四纪早更新世（248—73万年前）地层的标准地层，把中国的早更新世称为“泥河湾期”。这个盆地由此声名鹊起，以其丰富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和地质现象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盆地也因此被人们称为“泥河湾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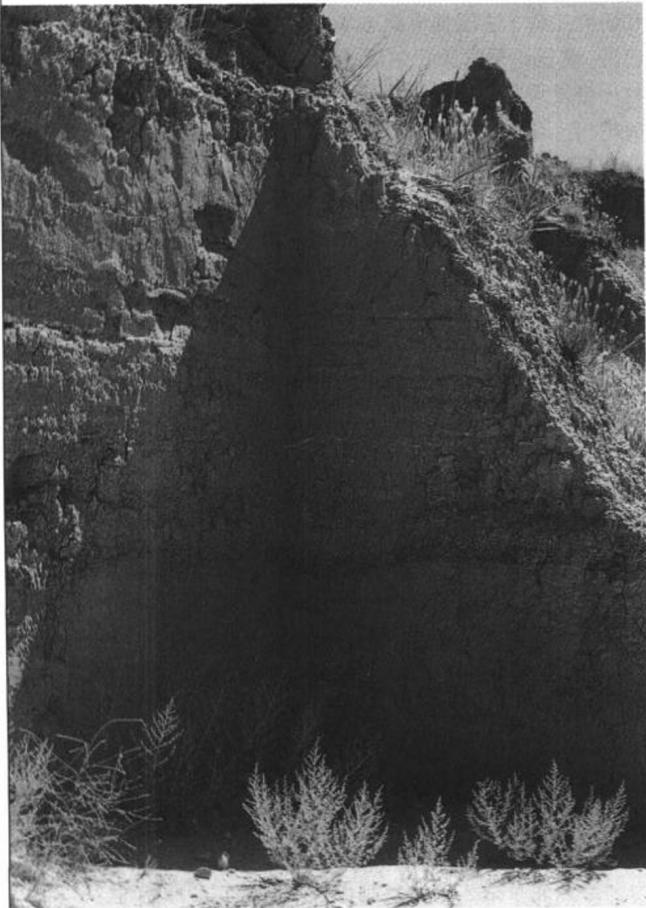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这套堆积厚达600余米的泥河湾层是一个跨时代的概念，它不仅指单一的早更新世，而且包括了整个更新世，即从200多万年前一直延续到距今1万年前，几乎涵盖了整个旧石器时代。

1935年，法国史前学家步日耶经过调查，宣布他在泥河湾村东北的下沙沟村附近地层里找到一件粗糙的石器——手斧，并在动物化石上发现有人工作用的痕迹。他认为，在泥河湾一带早更新世时就已存在着原始人类。但由于石器上的人工加工痕迹看起来有些模糊，许多学者对此观点表示怀疑而未能接受。与此同时，在距离盆地不远的另一个地方——北京周口店的一个洞穴里，出土了轰动世界的北京猿人化石。北京猿人化石的时代大约距今50—20万年。考古学家认为，虽然北京猿人的石器制作技术有一定的原始性，



左 小长梁
遗址(距今100万
年左右) 远景

左下 1996
年中美合作发掘
的飞梁遗址(距
今90万年左右)



但还不是最早的。应该还有更早的。于是，考古学家开始重视泥河湾盆地。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在这个盆地相继发现了60多个遗址或地点。新的重大发现应运而生。由此建立起来的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成为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尺。

王择义和卫奇等人在桑干河北岸发现的虎头梁旧石器晚期地点群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了发掘，遗址时代距今1万年左右，出土石制品2万多件。1973年，贾兰坡等在山西、河北两省交界处发现了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并发现了同时期人类化石，时代距今12.5—10.4万年。在1976的发掘中，该遗址出土石球10万枚，但其功能至今没有一个学术界公认的看法。1978年，尤玉柱等在大田洼一带发现了小长梁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年代100万年。1981年，卫奇等在这一带又发现了东谷坨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年代与小长梁遗址大体相当，并在1991—1997年对其进行两度发掘。90年代，与东谷坨年代相近的飞梁、岑家湾、半山、霍家地地点以及年代更早的马圈沟遗址也被相继发掘。它们的地理位置非常接近，所用石料基本是就地取材，以当地所产燧石为主，具有北方小型石器的技术特征。

此前，在山西省芮城西侯度、云南元谋上那蚌等地都发现了年代超过100万年的遗址，但这些遗址的可靠性长期被学术界质疑。而小长梁和东谷坨遗址是惟一得到公认的比较早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

1994年发掘的岑家湾
遗址（距今97万年左右）

因此，考古学家相信，以小长梁和东谷坨为代表的区域应该是早期人类起源的重要地点。从石器制作技术上看，它们与北京猿人遗址同属于华北小石器文化传统，而且比北京猿人的年代更早。

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学者热衷于在泥河湾一带寻找早更新世的古人类化石及其石器文化，旧石器考古学者谢飞和他的考古队员们因此得以借鉴国际考古学界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对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发掘技术做出了更新和改进。此后在泥河湾盆地中展开的大规模调查、发掘和研究，又发现了几十处旧石器文化遗址或遗址群，并相继发掘了岑家湾、飞梁、东谷坨、马圈沟等距今100万年上下的早期遗址和虎头梁地点群、箕籍滩地点群等一系列距今1万年上下的晚期遗址。早期遗址内的打制石器，较多地使用了燧石原料，而且技术上呈现出一种并非最原始状态的特点。学者们因此认为，无论是石料的选择，还是石器的制作技术，泥河湾盆地目前发现的距今100余万年的旧石器都应该能够找到更早的鼻祖。

1992年，在相当于小长梁遗址文化层下部10余米的地层中发现了另一个旧石器早期遗址——马圈沟遗址，并发掘出了2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100余件。按一般埋藏规律，它的年代要明显早于小长梁遗址，即超过100万年。2000年，考古工作者发现马圈沟遗址中下层也含有旧石器和动物化石。2001年10月，谢飞等人对该遗址中下层进行了发掘，又发现了石制品和象化石的原生堆积。据推测，其年代已超过了150万年，它们是迄今为止在泥河湾盆地发现的最古老的旧石器遗址。

这就是神秘的泥河湾盆地！

盆地中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从距今1万年开始，往前一直追溯到了一百几十万年前，灿若繁星的古文化遗址中包含着丰富的人类文化遗物，然而他们主人的遗骸却始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目前发现的古人类



楔形石核，马鞍山遗址出土

化石只有1976年从许家窑遗址出土的几件，包括儿童上颌骨、成年人的牙齿和不同年龄个体的头顶骨和脑后枕骨，考古学家们根据化石人的体质特征和石器工业认为，许家窑人可能是北京猿人的后裔，文化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其后，调查者的脚步依然穿行于盆地内的沟沟壑壑，但依然是长久的沉寂……但无论哪一种猜测，都无法避免矛盾的尴尬。这个谜团困扰着几代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他们期待着有朝一日撩开“泥河湾主人”的面纱。

三、科研探索的圣地

距今1万年前后，随着末次冰期的结束，人类完成了一次变革：农业、定居、陶器以及磨制石器的出现，重新孕育了一个时代。关于新、旧石器时代如何过渡的问题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泥河湾盆地的桑干河两岸有一批像箕籍滩遗址群、虎头梁遗



距今超过1万年的马鞍山遗址发掘现场

址群等年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鉴于对这一学术热点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谢飞和王幼平分别主持了对上述遗址群的一系列发掘。

这些遗址共同的特点是，石制品非常丰富，两个遗址群出土的石制品总数达几万件。以火山角砾岩（或称为石英岩）为主要石料，边刮器、端刮器、雕刻器为主要器型，最醒目的是大量的楔形石核及其相关产品如细石叶、废片等等。细石叶制作过程的各个阶段的产品，都可以在这些遗址中找到标本。其中重点发掘的几个遗址，像80年代末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独立发掘的箕籍滩遗址，90年代中期与北京大学合作发掘的于家沟遗址、马鞍山遗址等等，都具有典型的原生埋藏的特点。石制品往往在局部地点集中地有规律地分布，并从中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和用火遗迹。这些遗址的主要石料都非常相似，似乎暗示着它们有共同的石料产地。发掘者更倾向于多数遗址具有石器加工场的功能。

1995年对于家沟遗址的发掘几乎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掘者陆续在大量埋藏楔形石核的黄土层中发现了十余件陶片。香港中文大学热释光年代实验室所提

供的有关它们的测年数据为距今11700年左右！这些陶片有着相同的原始特征：陶胎厚，其中夹杂着许多粗颗粒的砂粒、碎蚌屑；它们表面颜色不纯、粗糙不平，因烧制火候低、陶质疏松，很容易破碎。此前，日本、蒙古、西伯利亚等地和中国华南地区也有超万年陶片的报道。于家沟遗址出土的陶片再次证明，制陶术在中国的发生，比我们知道的要早很多。而且，与陶片同时出土的是大量打制石器，没有磨制石器。后来被评为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于家沟遗址，其剖面具有明显的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意义。遗址下部是典型的旧石器遗存并伴有陶片，年代距今超过1万年；遗址上部则是新石器时代墓葬，距今在8000—5000年上下，遗物的过渡是渐进的。应该说，至少在华北地区，该剖面对于研究农业的起源以及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等重大学术课题，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如今泥河湾盆地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盆地，每年都吸引着众多国内外旧石器考古、古人类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前来。他们中有的人一踏上这片土地就谦逊地说：“我是来朝圣的！”泥河湾盆地对于孜孜以求的科学家来说，是一块科学的研究的圣地，尤其是旧石器考古的一块圣地。

中国新石器革命的摇篮

——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揭秘

周广明

农耕和家畜饲养，作为进入新石器时代食物生产时期革命性变化的标志，被考古专家们认为是人类自学会控制用火以来的一次“最伟大的经济革命”。

在考古发现中，新石器时代是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在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植业和饲养家畜为特征的。与旧石器时代相比，狩猎、采集、捕获活动已逐步退居次要地位，文化面貌也有了极大改观。当然，二者之间的区别是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进步而逐步实现的。农业起源是公认的“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农业的起源问题是一个时期以来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从考古学上说，只有通过这个领域的研究，才能了解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初始阶段。就其重要性而言，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课题，大概只有对最初的工具制造者——几百万年前人的研究。因此，农业起源问题为愈来愈多的考古学家所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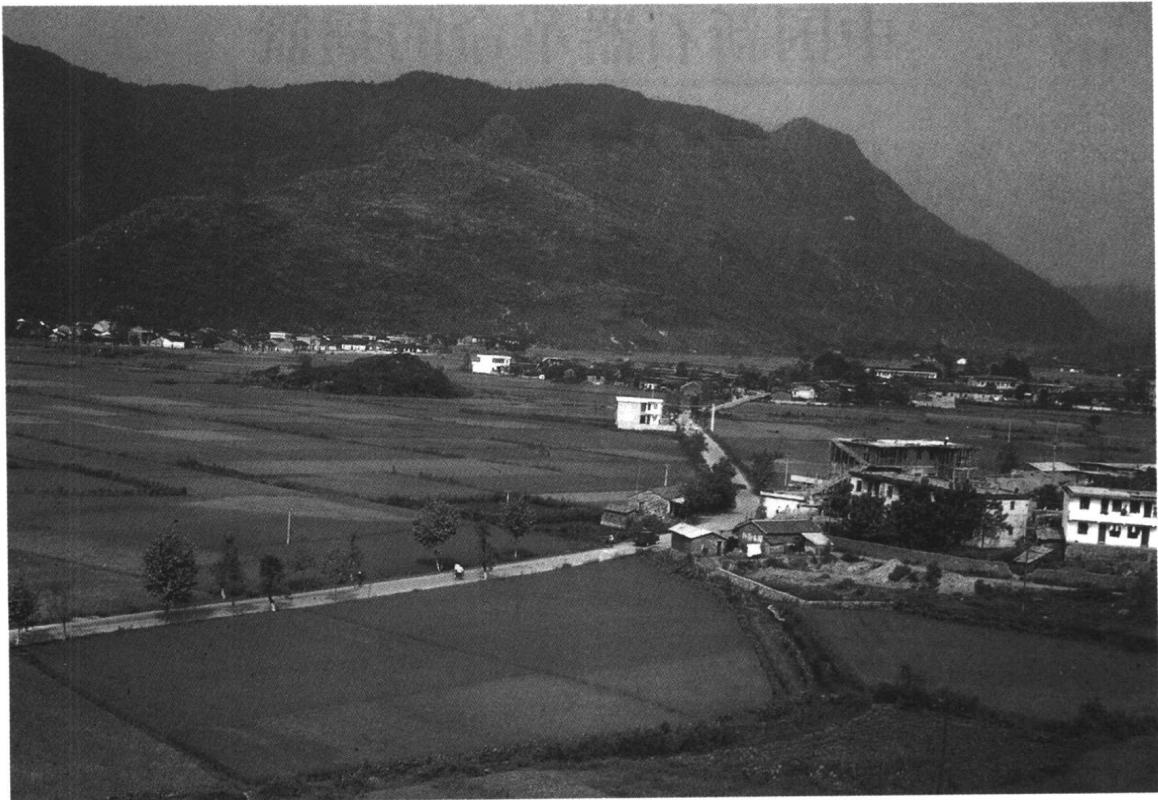
日本的农业史学家渡部忠世在《稻米之路》中写道：“丝绸之路是贵族之路，稻米之路是大众之路。”因此稻作的寻根考古，即稻作的起源、驯化和栽培等一直是考古学家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一、中国是世界稻作的发源地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以前苏联农学家为首的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印度发现的稻谷距今5000年，是世界稻作的起源。日本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稻作距今4000—3000年，韩国发现了5000—4000年的稻作，因此日、韩两国也加入了稻作起源地之争的行列。但是，

随着浙江河姆渡和罗家角遗址距今7000年稻作标本的发现，以及湖南彭头山遗址稻作农业遗存的确认，中国作为世界稻作发源地的地位得到世界学术界的公认。要寻找稻作农业的起源，只有到中国。正是在此共识的基础上，中美两国学者在经过实地考察后选定了发掘目标。1993年9月1日，《中美联合对赣东北地区稻谷起源问题进行考古发掘及多学科研究协议》正式签订。寻找稻作起源的帷幕在中国江西境内被拉开了。

1993年和1995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安德沃(Ardoer)考古基金会联合组成中美农业考古队，中方领队为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副领队为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彭适凡研究员，美方领队为安德沃考古基金主任、著名考古学家麦克尼什博士。中美双方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发掘队伍，开展了对万年仙人洞取样、发掘和对万年吊桶环遗址的发掘，并对两遗址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些发掘和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遗物，获取了大量自然、人文信息。经有关专家学者评审，这些考古成果被评为1995年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由于仙人洞与吊桶环田野发掘的科学成果显著，该考古项目还荣获中国国家文物局颁发的1995年度田野考古发掘二等奖。1999年夏，为了解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完整的地层堆积，考古人员在1993年和1995年度发掘工作的基础上，又对它们继续进行发掘。初步研究结果表明，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地层堆积，涵盖了由旧石器末期向新石器过渡的完整的地层序列，对于研究人



上 大源盆地局部



左 吊桶环外景

类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尤其是对有关稻作农业的起源、陶器的发现、动物的驯化等重大学术课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二、远古人类生产、生活场景的复原

万年县地处江西省东北部，位于乐安河下游、鄱阳湖东南岸。东与弋阳、贵溪相邻，南与余江接壤，西与余干交界，北与乐平、波阳毗连。地势东南高、西北低，由东南向西北倾斜，气候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四

吊桶环探方剖面图

季分明。早在旧石器时期，这块土地上就有人类活动，新石器时期至商周已有聚落，春秋战国时期属吴、越、楚管辖，秦汉时期分属番县及余汗县境，吴、晋至隋仍为鄱阳、余汗二县地，唐以后为鄱阳、余汗、乐平、贵溪四县属地。明正德七年（1512年）析鄱、余、乐、贵边交之地设县，以县治于万年峰之阳而得名。

仙人洞遗址位于大源盆地境内，四周高山环拱，中为条带状葫芦形盆地。其地貌特征为溶蚀峰丛洼地丘陵，溶洞众多，岩石溶蚀强烈，形成群山突起的地貌。仙人洞位于葫芦形盆地西北的小荷山脚下，洞前左侧50米许，有一条名叫大源水的河流，从东南沿着仙人洞左侧的小荷山脚向西北流去，注入乐安河。仙人洞洞口面向东南，海拔高度35米，洞口底部高出洞前水稻田2米左右，洞口开阔并前伸。

吊桶环遗址位于大源盆地西南部的一座海拔高度为96.2米的山岗上，距仙人洞遗址的直线距离为800米左右。两遗址的海拔高差为60米，因后者形如一水桶吊环，故被当地老乡称为“吊桶环”。其实它是由岩石经长期地质作用而形成的岩棚，在古老的比较陡直的岩石断面上，软质岩石被风化或被剥蚀后，坚硬的岩石就凸露出来，成为可以遮阳避风的场所。吊桶环遗址有两面石壁，没有由岩石构成的出入口，露于旷野的一侧朝向东南。

1962年2月间，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到万年县作考古调查，听到该县文化馆姜同志对仙人洞洞穴遗址的反映前往勘察，初步确定它是一处古代洞穴遗址，同年3月间即组成发掘组对其进行了为期50天的试掘。为了进一步了解其文化内涵，1964年4月对仙人洞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历时35天的发掘，随着20世纪60年代两次发掘材料的公布，万年仙人洞遗址已愈来愈引起中外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的重视，被专家们认为是“华南全新世洞穴堆积剖面的代表”。然而由于当时发掘条件和研究水平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对整个遗址进行全方位的尤其是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等



诸多方面进行考察，许多自然文化的信息无法获取。而20世纪90年代的三次科学发掘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则向我们展示了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历史的、逻辑的文化演进过程，勾画出了远古时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全息历史图景。

从仙人洞、吊桶环两遗址所反映的整个大源盆地的文化发展的演进过程来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大源盆地为一沼泽地带，早期的原始人类在盆地周围的山冈上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吊桶环遗址由于其所处海拔高度相对仙人洞遗址为高，因而原始的“队群社会”首先利用了这一半封闭的岩棚作为狩猎、采集的临时居住地或季节性的营地。考古发掘显示，在原生堆积之上，先是出现用火的痕迹，此后，吊桶环遗址就一直不间断地被使用，这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物比较少见，与烧火堆伴出的只有少量兽骨。吊桶环遗址下部有代表性的早期地层，（距今约2.3万年），用火面积相对较大，痕迹更为明显，并开始出现形体较小的石片石器。石器原料主要是燧石、石英与水晶等硅质岩类，硬锤技术普遍用于各种原料的剥片，砸击技术也有较多的应用，但石器加工修理比较简单，刻意精细加工的定型石器基本不见。石器组合有边刮器、端刮器、凹缺刮器、钻具等，其中可归入边刮器类型的数量较多。石器工业的整体面貌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流行的石片石器没有太大区别，并开始出现角器，其中一件角斧是利用带基部的鹿角加工而成的，它的下端被刮削出双面刃，磨制精细，是旧石器晚期制作精美的角器之一。

随着生活在大源盆地周围的“队群社会”人口的增长和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开始于距今1.6—1.8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期带来的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大源盆地的原始队群开始了对仙人洞的开发和利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吊桶环中部与仙人洞靠下部的地层，开始出现大量的大型石器，形成了小型石片石器与大型砾石石器并存的局面。这一时期，人类对兽骨、蚌壳开始进行加工利用。这一时期的蚌器，蚌体宽大、厚重，壳体低平，表面较光。壳体打凿有孔洞，有双孔和单孔之分，孔径较大，孔洞主要由壳体腹部向背部方向进行单向打凿琢制而成，孔洞边缘被稍加琢磨和修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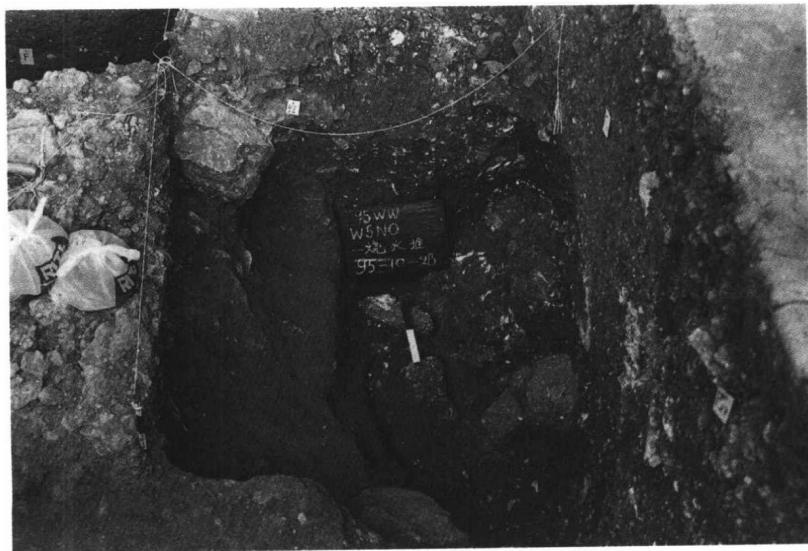
晚更新世末，地球上的最后一次冰期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温暖潮湿的环境，由此引起稻属植物的大规模北侵。吊桶环遗址出土的大量稻属植硅石及对其中的双峰类型检测结果证实，早在约1.2万年前的更新世末期，野生稻已分布到了长江南岸，而且被当时的居民所了解和作为食物采集。这是在长江流域首次发现的在栽培稻出现之前的野生稻的考古遗存。这一发现为在长江流域寻找栽培稻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类历史进入距今1万年左右。这一时期气候逐步变暖，人类生存环境进一步发生变化，禾本科植物尤其是大源盆地低洼沼泽地带野生稻分布更加广泛。仙人洞文化先民对野生稻由发芽生长、抽穗结实到成熟死亡全过程，经过多年复一年的观察，依靠经验的继承和群体的记忆，有意无意地开始了对自然界的模仿。通过对稻属植物植硅石的分析研

究，推测在吊桶环可能同时埋葬有野生稻和栽培稻的遗存，因而早在距今1万年前，栽培稻就已被驯化出来，出现了原始的稻作农业。仙人洞出土的鱼镖头为有效的叉鱼复合工具，上端柄部呈等腰三角形，两面起脊，两侧有两个对称的凸节，背面左侧有倒钩三个，右侧有倒钩四个，前三列的排列基本对称。鱼镖背面脊棱及脊棱两侧均锥剖数条横道。它和骨矛形器上的刻划横道一样，应是中国最早的原始记事、记数符号。骨投掷器主要是借助杠杆发力的一种复合工具，其特征主要是在兽角柱状一端由骨表向腔体方向凿制连续或不连续的“V”型凹槽，凹槽下端往往锯剖一圈或半圈凹道。这种复合工具以往在欧洲、南美洲发现过，是原始人类狩猎文化的一种具体物证。

三、发现世界上最早的陶器

随着人们对“粒食”植物的采集、种植及食用，人们的饮食文化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于是人类发明了陶器。两遗址出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最为丰富的陶器。20世纪60年代与90年代，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共出土早期陶片800多块，对它的全面研究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陶器的起源与工艺发展过程。初步研究的结果表明，仙人洞先民们主要以当地红土作为制陶原料，但有时也可能用当地的普通黄土。早期陶片多为器腹片，也有少量器口片。这些陶片的陶土都很相似，陶土中常见倍半氧化铁结核，应出自波动水环境下的淤积土，所有陶片的陶土中都掺加有粉碎的石英岩石，石英岩的颗粒一般较粗大，有些可达1.5厘米以上，分选不好，显然未经过进一步筛选。由于同时期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的石英岩石器，说明附近可能会有这样的原料。陶器的烧成颜色以褐色为基调，有褐色、暗褐色、红褐色和灰褐色等多种。不少陶片还有黑色夹芯，说明陶胎氧化不充分，可能不是在陶窑中烧制的。陶器的制坯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泥片贴塑法，另一种是泥条叠（圈）筑法。其中，泥片贴塑陶是用长方形的泥片一片片



烧土堆

右上 兽骨堆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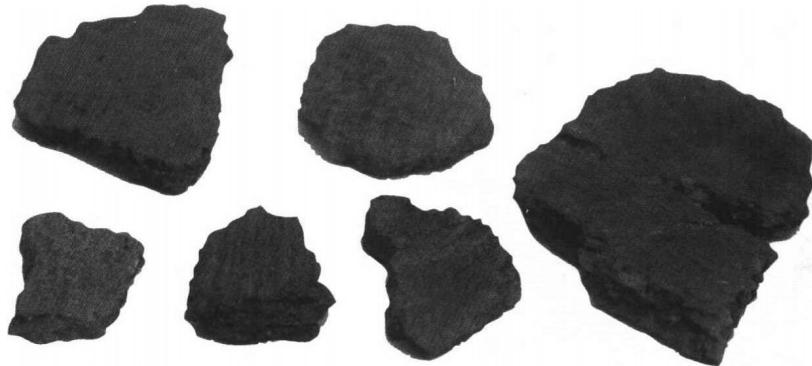
右下 仙人洞出土陶片

向上贴塑的，其修整方式是以竹（或木、骨）质平齿形片状器在器表平行刮抹，在陶器的内、外壁都留下了类似浅蓝纹的条状纹，在器口片上可见到这类条痕一直延伸到唇部，可以称之为条纹陶。泥条叠筑陶的做法是用2—3厘米宽的泥条层层向上叠筑成器坯的。这类陶器在修整成形时，有的用绳拍打以使泥条紧密接合，有的则可能是用鹿角一类的东西拍打的，此种鹿角拍应是晚期陶拍的雏形。拍打后在器表也印下了类似的“绳纹”痕迹，因此这类陶器被称为

绳纹陶。仙人洞和吊桶环年代最早两种陶器同层位炭标本的年代都已在距今1万年以前，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器之一。

这一时期，吊桶环遗址从出土遗物和遗迹现象判断，已不属于居住遗存，而应是一临时性屠宰场所和收割后的打谷场，表明当时人们狩猎归来，在吊桶环肢解动物、剔肉和分食。在食物充足时，他们将多余的鲜肉带回居址，晒干后以备整个群落的人们食用，食物不足时还得砸碎兽骨吸髓。北美有关民族学的材料亦可证实这一生活方式，生活在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现在仍然如此。而仙人洞遗址则主要是当时的居址。

晚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是人类历史上至为关键的发展阶段。大约在1.2万年左右，人类进入了地质



学上的全新世时期，地球上的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了，中国全新世早期气候开始转暖。随着气候逐渐转暖，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在新环境下，原始人群的生产活动也随之改变，它导致了旧石器时代的结束，从而开始了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就是从单纯的攫取天然产物的掠夺经济转变为种植农业、饲养家畜为主的生产经济的过程。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从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完整地层序列及文化内涵，明确无误地向人们展示了这一文化演进过程，其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传承性，地层序列所反映出的当时的环境演变，有助于专家们深入了解这一演进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华南地区人类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演进模式。

长江下游史前文明的明珠

——金坛三星村遗址考古收获

王根富

金坛市地处长江下游地区的江苏南部，全市总面积975平方公里，人口54万。金坛西依茅山，南临洮湖，境内以平原、丘陵为主，河网密布，水运发达。这里一年四季分明，气候宜人，青山绿水，风景秀丽，人

文景观众多，素有“江东福地”的美誉。

一、奇特的三星石

在金坛城西南9公里，有一个古老的自然小村落——三星村。三星村属西岗镇，地处茅山山脉的东

三星村遗址远景



边，洮湖和丹金溧漕河之西，附近地势平坦，大小河流环绕和穿插其间。在现今的三星村之北有一明显突起的高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它就是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上目前有杂草、树木和小竹林。在古遗址西北约100米处，有三块独立的巨型石块相对集中地分布在水田之中，十分醒目。据世代居住在此的村民介绍，这三块巨石不知是从何时开始出现在此，根据代代口耳相传的说法，它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星”，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陨石”，三星村的名称即由此而得。三星村附近绝无其它石、山之类，该地是河网密布的水乡平原，在其西十余公里处虽有山、石，但两者的石质有明显的区别，三星石的石质特别坚硬。三星石是否属陨石，目前尚未做出正式的科学鉴定，经过我们调查，三块石头相对集中地靠在一起，呈自然不规则块状，露出地面的部分较小，地面以下的部分逐渐变大。据村民介绍，三块石头原先高出地面70—80厘米，但由于逐年缓慢下沉，现在已有一块沉入地面以下，另两块尚微露于地表。当地曾有好奇村民开挖过此石块，欲了解石块的大小和形状，但发现随着开挖深度的增加，石块也在逐渐扩大，挖了3米多深仍不见石块的底部，后因下挖困难而结束。我们从石块各自逐年缓慢下沉的现象来判断，此三块巨石应为相互独立之石，是由于泥土受到水的浸泡作用而使石块缓慢下沉的。附近没有发现同类石材，农田中何以出现三块巨石？“三星”的成因成了一个难解之谜。

二、荒丘寻宝

在今三星村之北有一个圆台形的低矮高地，高地上生长着树木、竹林和杂草，这就是著名的三星村古文化遗址。20世纪60年代这里是一块较高的荒地，在地势平坦的水网地带显得很突出，由于适宜种植的农作物较少，当时村民首先开始在高地上栽种竹子。较高的地势和古文化遗址松软、肥沃的土质，非常适宜竹林生长。经十余年的自然发展，三星村竹园已初具规模，成为远近闻名的大竹园，可以说是“林阴蔽日、郁郁葱葱”，有些竹子的直径达10厘米。在当时那个集体经济还不十分发达的年代，大竹园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当地村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做出过巨大贡献。可以说，三星村村民对竹园有着十分浓厚的感情。

20世纪80年代初期，历经二十多年的生长，竹龄已渐渐进入老年化阶段，竹园随之出现大面积枯死

和竹子开花现象。村民们为此焦急万分，当时三星村的村民还不清楚真正的原因，他们经多方琢磨、对比后认为，竹子枯死、病变的原因是竹园干燥缺水使然，解决的办法是引水灌溉。于是，他们就在竹园内相隔十余米开挖宽2米，深1.5米的东西向的长沟数条，用于引水、蓄水。现据当时参加开挖沟渠的村民回忆，他们在开挖沟渠时发现有较多的人骨、石器和陶器，有些器形光滑规整的石器被村民带回家中当作玩具把玩；陶器则多被砸碎，看里面有无“宝贝”；大量的人骨则被弃置荒野。这实际上是三星村古文化遗址的首次面世，但由于当时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局限，此发现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1983年冬季的一场大风雪几乎将竹园的竹子全部摧毁，三星村竹林从此走上了荒芜阶段，目前已成小竹、树木及杂草丛生的荒丘。1985年春季，江苏省进行全省文物普查，文物干部从三星村村民手中征集到一些遗址出土的文物，这是文物工作者首次了解三星村古文化遗址。1985年底，全省文物普查成果展在南京博物院举办，金坛三星村出土的石器、陶器被首次展示给观众。1985年，笔者刚毕业到南京博物院工作，当我在展橱内看到金坛三星村出土的文物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首先，这些文物很有地方特点，与长江下游地区已发现的原始文化存在明显的区别，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其次，我的老家就在金坛，离三星村仅8公里，孩提时代就常听说“三星”之名。当时我想，自己若能让三星村的原始文化发扬广大该多好啊！这也是一个考古工作者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和家乡人民的贡献。因我老家距三星村较近，所以我利用假期回家探亲访友的机会，多次到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论证，确认这里确是一处极为重要的古文化遗址。

三星村遗址紧邻村庄，随着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地方政府的村镇建设工程时常会对遗址造成威胁，如修村镇公路、开挖鱼池、建房等，都危及过红烧土遗迹及文物。1993年，南京博物院考古队鉴于三星村遗址的现状及学术研究价值，向国家文物局申报抢救性发掘。同年5月，国家文物局批准了以我为领队的发掘计划。自1993年到1998年，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六次发掘和一次钻探，共发掘面积640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的墓葬1000余座，出土玉器、石器、陶器及骨角牙蚌器等各类文物4000余件（组），还出土了大批保存完好的人骨标本及距今6500年前的炭化水稻标本，基本掌握了地下文物遗迹的分布规律，为遗址的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这项考古发